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季节燃起的花朵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

李光荣 宣淑君 著

中华书局

作者简介

李光荣，云南省永胜县人。1958年生，1982年春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一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随樊骏先生访学一年，先后任教于红河学院和云南师范大学。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3项，获省部级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编著有《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和《西南联大名师书系·语言文学大师风采》等。



宣淑君，云南个旧人，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十八年中学语文教师生涯，十年图书馆馆员经历，现任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求知问学，从不懈怠，无论做工作还是搞科研，一贯报以追求完美的执著态度，发表论文30多篇，参著《西南联大名师书系·语言文学大师风采》等书，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3项。



序

钱理群

作者在本书跋语里提到,在确定选题时,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樊骏先生。作者曾作过文学所的访问学者,樊骏先生是他的导师,按说樊骏先生应该是最恰当的序作者,但樊先生身体不好,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了。作者也提到我对他的研究的关注,这也是事实:我和李光荣的交往已有十多年了。那么,我就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来谈谈读了书稿以后的观感吧。

我拿着这本厚实的书时,首先想到的是:“有人在默默地研究,而且是在遥远的山城。”这是我十年前为贵州一位年轻学者的鲁迅研究著作而写的序言里说过的一句话。在文中我还很动感情地谈到,二三十年前,自己也在贵州做过研究,“为寻找一条资料,解决一个难题,不知道要费多少周折,这其中的艰辛,非亲历者绝难体会”。我因此说,自己“对边远地区的研究者,总是怀有特殊的敬意。而且我深知,在如此艰难的几乎是孤立无援的处境下,要坚持研究,并作出成绩,是需要有一种强大的内在精神的支撑的”(《袁荻涌〈鲁迅与世界文学〉序》)。这大概也是我十数年来一直在关注李光荣的研究的原因所在。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李光荣的云南老乡、老师,我的老学长蒙树宏先生。王瑶先生在为他的专著《鲁迅年谱稿》所写的序言里,也说到蒙先生“身处南疆,默默耕耘,历时十载,反复修订,这种精神十分可贵”(《鲁迅生平史实研究的新收获》,文收《王瑶全集》第8卷)。这说明,在云南、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默默研究者是大有人在的,我们在考察“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地图”

时,是不能忽略这一方土地的。而且这种研究也是自有传统的:本书中多处引述蒙树宏先生的论著,显然受到教益和启发,而且不只是具体的学术观点,更有着学术精神、方法的影响。

那么,这是怎样的精神与传统呢?我想把它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老实人做老实学问”。

首先是“老实人”。应该说,在边远地区进行学术研究是有特殊的困难的。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孤立无援的学术环境之外,也还有边远地区特有的相对懒散、闲适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人的惰性,繁琐而又温煦的人事交往对人生命意志的销蚀,视野的局限,由此造成的既自大又自卑的心理等等。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要坚持学术研究,是很难很难的,它需要特殊的素质。第一要有对学习、学术的特殊爱好,以至痴迷,有强烈的精神追求,这样才能以读书与研究作为生命的内在需要,作为精神的支撑,才能如本书作者在《跋》里所说,对学术有实实在在的“生命投入”,使读书、研究、写作成为自己基本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也才会有鲁迅所强调的“韧性”,即所谓“慢而不息”的精神与意志。此外,还必须甘于寂寞,拒绝诱惑,淡泊名利,特别的勤奋,超人的努力,有鲁迅所提倡的踏踏实实“做小事情”的“泥土”精神(《未有天才之前》),等等。这些就构成了我所说的“老实人”的精神内涵。鲁迅说,这样的人,“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忆韦素园君》)。

其实,一个真正的学者大概也都是具有“老实人”精神的,并不只局限于边远地区的学者。只不过边远地区的学者要坚持学术,就更需要这样的“老实人”精神的支撑。我还要补充一点,当一个边远地区的学者,有了这样的“老实人”的眼光、胸襟以后,那些一般人看来边远地区的不利因素,又都可以转化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我在贵州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很多事情都要从两面看。比如相对来说,贵

州发展机会比较少,但也因此没有多少诱惑,认准一个目标,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做。贵州比较空闲,生活节奏慢,有的人因此变得懒散,但对另外的人来说,这样的闲暇,正可以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悠悠闲闲、从从容容、潇潇洒洒地做学问。贵州外在的信息比较少,这自然需要用加强对外交流来弥补,但外在的东西少,却又把人逼向自己的内心,开发内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悟性好的人,正好把自己的生命和学问引向深厚。因此我经常说,贵州是一个练‘内功’的好去处”(《我的书院教育梦》)。处于学术中心位置的学者也是要练“内功”的,他的办法,就是身处中心而自我“边缘化”。边远地区的学者却因地理位置的缘故而被客观边缘化了,这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把它变为好事,完全没有必要因此而怨天尤人,如果进一步身处边缘而总想自我中心化,那就更是南辕北辙,走岔路了。这本身就是违背做“老实人”的原则的。

应该说,我们面前的这部《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就是一部“老实人”写的著作。没有持续五年的生命投入和“慢而不息”的精神与功夫,是写不出这样厚实的著作的。更重要的,这里还包含了做“老实学问”的精神与方法。

首先是老老实实在自己的实际出发,选择研究对象,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其实就是本书《跋》里提到的樊骏先生和我当年建议李光荣选择西南联大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的原因所在。这就涉及近些年许多人都在关心的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地方学者的作用问题。我刚参加了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中心、文学院主办的“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建构下的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有一个发言,特别强调了作为西部落后地区的地方学者研究本地文化的意义:这是摆脱长期以来的“被描写”的地位,“自己来描写自己”的自觉努力,同时这这也是一个“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的生命的“寻根”过程。而这样的研究,不仅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文化重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建构无疑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我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本书对西南联大文学、文化的

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的。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的文学、文化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下,所形成的云、贵地区的本土地方文化与联大师生所带来的外来文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中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一次历史性的相遇,正是这样的有着多元文化因素的新型文化,既成为今天云南地方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具有全国的,以至世界的意义。它的研究内涵是丰富的,研究的天地也应该是广阔的。因此,我建议作者还可以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非文学的社团,当年许多西南联大老师和学生深入云南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方面、多学科的调查与研究,这都是非常有意思,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的。

强调地方学者对地方文化研究的责任和意义,绝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只能局限于此: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前面所说的边远地区外来干扰少、便于逼向内心的特点,反倒有利于作形而上学的追问和思考——当年王阳明最终在贵州“悟道”大概不是偶然的。这或许是我的一个浪漫想象:在边远地区是最适合于做“最实”与“最虚”的这两头的研究的。在这两个方面,地方研究者都是大有可为的。

本书的研究,大概是属于“最实”的研究。于是,我注意到,作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和研究策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从研究文学社团入手;研究文学社团,从弄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所谓“基本事实”,包括每一个社团从何时,因什么原因而开始;有哪些参加的成员,其组织方式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主张;进行了哪些活动,特别是办了什么刊物;选择什么文体,发表了一些什么作品;在文学创作方法、艺术形式上有什么追求,做了哪些实验;各社团之间又有什么关系……一切分析、结论都应该建立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一切研究都应该建立在准确、全面的史料基础上,这本来都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常识。所以,一切严肃、认真的学者都十分重视史料的工作;鲁迅就强调,他的小说史研究,在史料上是有“独立的准备”的。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经验。王瑶先生在为蒙树宏先生的著作所作的序中,就强调了史料搜集、考订的“基础”意义,并特地提出蒙先生为云南大学研究

生开设“鲁迅生平史料研究”课,对“青年研究工作者打好基础,掌握治学方法”的重要意义。李光荣、宣淑君两位显然延续了这样的治学传统,给本书的写作订立了“以史料说话”、“尊重基本事实”的原则,“坚信见解人人可发,而材料(事实)是唯一的”。本书在有关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史料的发掘、搜集、爬梳、辨析、整理上,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不仅查阅了可以找到的一切文字材料,而且对可以找到的当事人都进行了采访,获取了大量的“口头历史”材料,并且进行了认真的考订。这样,本书就大体上弄清了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基本事实,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不仅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而且包括西南联大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而且为穆旦、汪曾祺、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等作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研究线索与思路。比如本书提到了对这一时期汪曾祺的十多篇小说的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贡献。可以断言,后来的研究者要再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和文学,是无法绕开本书的。——这又使我想起来,当年我们做研究生时,王瑶先生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每一篇重要论文、著作都要做到别人再做同样或类似的课题,都绕不开你,非要参考你的文章不可,尽管后人的研究必然要超过你。我想,王瑶先生这里所说的“不可绕开”,不仅是指你的研究,是否达到、代表了一个时期的研究水平,也是指你在史料上是否有鲁迅说的“独立准备”,为后来研究提供可靠的基本事实。

或许更加可贵的是,这背后的学风,研究精神。王瑶先生在前引蒙树宏书序里,也是给其“反复考核,力求准确”,“务求翔实”的“严谨的学风”以很高评价。本书的作者在《跋》里谈到他们“为寻找一则资料寝食不安,为求证一条资料费时数月”,我也深受感动。这同样是有一个传统代代相传的。本来,学问就是应该这样做的,我会这样大受感动,就是因为这样的做学问的常识现在被抛弃了,学术研究的底线被突破了。许多的“研究”,可以不顾基本事实而随意乱说,或者依据未经考订、并不可靠的材料,危言耸听,大加炒作,或者抓住片面的材料而任意发挥,大做文章。在这样的虚假、浮华的时风影响之下,像本书作者这样,甘坐冷板凳,做“老实学问”的“老实人”,反而

显得不合时宜,并常常被忽视。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愿意借本书的出版,聊抒感怀,给边远地区的寂寞的研究者以慰藉,为这样的老老实实的研究作鼓吹——尽管未必有多大作用。

2008年11月24日

第一章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综论

文学是人类精神沃土上的奇葩，它不择时地而生，富贵不一定使之繁茂，贫穷并不会让它萎谢，只要精神的土壤不贫瘠，就有文学之花开放。

日本侵略军进犯我北平、天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师生历尽艰辛南集于长沙，又长途跋涉西迁到云南，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组成了名扬天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学生虽然吃的是“八宝饭”，穿的是“空前绝后”的鞋袜^①，却沉浸在知识的兴味中，而内心又时常被痛苦搅动：感时忧世、思亲念友是他们无法消除的隐痛。尽管岳麓山色、南湖风光和翠湖的美景抚慰着他们的心灵，但他们仍然难以彻底“忘忧”。忧痛促进了他们对人生、社会、战争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有太多的思想感情和人生体验需要表达，于是他们将其形诸文字，写就文章。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于是乎蔚为壮观。

文学作品的特点在于交流，在于寻求认同者，而交流和“寻求”的现代表现方式之一是发表。对于声名不具、衣食尚愁的学生来说，最便捷的发表方

^① 西南联大学生戏称掺有多种杂物的米饭为“八宝饭”，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鞋袜为“空前绝后”。

式是出壁报。于是西南联大的壁报大为兴盛。办壁报需要联合同志、组织力量,因而形成了社团。西南联大的大部分社团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也有先成立社团,再办壁报或刊物的,但相对较少。

西南联大从1937年开始到1946年结束,共计九年。九年间,在学生中先后产生了一百多个社团。以学科而论,这些社团有政治的、法律的、英文的、历史的、物理的、戏剧的、音乐的……也有生活方面的,属于文学的只有十多个,它们是: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布谷文艺社、边风文艺社、文聚社、耕耘文艺社、文艺社、新诗社、新河文艺社、十二月文艺社等。西南联大学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文学社团成员创作的。但一些不以“文学”(或“文艺”)命名的社团也创作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有的还成绩显著,影响广泛,如戏剧团体剧艺社。

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分期,尚无定论,但从一般的论述看,大致分为五个时期:长沙临时大学时期(1937年8月至1938年2月)、“皖南事变”前时期(1938年2月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时期(1941年1月至1944年5月)、爱国运动高潮期(1944年5月至1945年8月)、反内战时期(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这种分期的主要依据是政治事件。的确,政治对西南联大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几乎决定着西南联大的“命运”。但文学不等同于政治,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学与政治有关,似乎又与政治局势的动荡起伏不完全吻合。文学社团也如此。根据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历史以及其他社团的消长变化情况,我们把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前期(1937年秋至1941年春),中期(1941年春至1943年秋),后期(1943年秋至1946年夏)。

以下将对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三个时期分别予以论述,各个时期的社团又分综合社团、戏剧社团和纯文学社团三类介绍。

第一节 西南联大的前期文学社团

西南联大的前期,经历了剧烈的动荡。1937年7月,战争的硝烟弥漫京津地区,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即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筹备临时大学,11月1日即行开学,由于创办仓促,因此校舍紧张,设施不全,图书匮乏,生活十分艰苦。此时全国上下抗敌情绪昂扬,师生精神状态较佳,大家克服困难,潜心教学,在衡山湘水间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不料前方战事吃紧,炮火逼近武汉,长沙不宁,教育部再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师生于1938年2月出发,跋山涉水,历时两个多月抵达昆明,于5月4日开学。由于昆明校舍不足,设分校于蒙自,异地办学。不久蒙自校舍被征为军用,分校迁回昆明。各学院分散于大西门外和拓东路,师生则散居全城。1939年8月,新校舍筑成,学校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校园,得以集中办学。但这时,日本飞机加紧轰炸昆明,有家眷的老师只好疏散到乡下居住,学生则采取“跑警报”的方式——听到空袭警报,立即跑向城外的田野和山间躲避。如果上课时警报响起,则立即下课,出后门跑向后山。为弥补损失,有时老师在树林中继续讲课。1940年7月,越南不保,昆明堪虞,教育部指示做迁校的准备。11月,成立叙永分校。1941年初,新生全部在叙永分校上课。这时,“皖南事变”爆发,西南联大随之遭受压力。

尽管生活如此动荡不安,文学活动却始终伴随着西南联大师生。其间,西南联大学生不仅创作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组织了一些著名的文艺活动,而且建立了一些社团,并且把工作开展得蓬蓬勃勃。在南岳,在蒙自,在昆明,都留下了学生的文学创作、文艺活动和社团组织及其工作的业绩。

下面将对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和文艺活动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的社团进行介绍。

一、综合社团

西南联大壁报的兴盛,长沙临时大学时即已开先河。在岳麓山的绿树环绕的校舍中,临大文学院的学生已经出过壁报。壁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关于抗战和岳麓景色的,表达抗战决心、鼓舞抗敌意志以及抒发战争造成的痛苦是其中心内容,关于要不要从军、要不要接受“战时训练”的问题也在壁报上讨论过。南湖诗社的发起人刘兆吉回忆:“在南岳时,曾多次出壁报,对于爱好写诗的人,已经心中有数”^①,所以,在蒙自组织南湖诗社很顺利。据此可知,临大文学院壁报的作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来南湖诗社的成员,他们曾在南岳壁报上发表过诗歌。至于壁报名称是什么、出了几期、发表文章的篇名等,今天所见资料均无记载,所以无法确定是什么社团办的壁报。

西南联大有名称记载的综合性社团,最早是群社。群社1938年12月底成立,以十几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核心,联络了20多个同学共同发起。成立启事贴出后,有近20人报名。其宗旨是“互相交往,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举行时事报告和学术报告,开展文体体育活动等”^②。成立会上选出干事9人,社长和副社长各1人,先后聘曾昭抡、余冠英、吴晓铃老师为顾问。干事会下设学术股、康乐股、时事股、服务股、文艺股、壁报股等各自开展活动,后又成立了群声歌咏队。群社的机关报是《群声》壁报,其内容较广泛,有时事分析、文艺创作、新书评介、漫画等。《群声》壁报上发表的文学作品篇名及其内容,不得其详,但它的主编林元即林抡元却是较为知名的。林元后来创办了《文聚》杂志,再后来参与编辑《观察》、《新观察》、《文艺研究》,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家。《群声》是他编辑才能养成的重要历程。林元也写小说和散文,发表在他主编的《边风》、《群声》、《冬青小说抄》及后

^① 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编《西南联大在蒙自》,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

^② 邢方群:《回忆群社》,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笛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来的《文聚》等刊物上。《群声》的另一位主编陈潜还编辑了壁报《大家看》，张贴在昆明街头，很受群众欢迎。由于群社坚持真理，广泛联系群众，注意解决学生生活的实际问题，在学生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社员发展到 200 多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正在这时，“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四处追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把西南联大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部分出面较多的进步学生疏散到乡下隐蔽，而这些人多数是群社社员，同时鉴于群社的政治色彩较浓，指示其停止活动。1941 年 2 月底，《群声》出了“终刊号”。“终刊号”贴出的当天下午，林元撤到乡下。群社至此解散。

1939 年秋，西南联大工学院成立了引擎社。这是一个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核心组成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为主体的社团，其性质和特点均与群社接近。在社团成立前，已有部分文艺爱好者编辑出版了《引擎》壁报，社团成立后，《引擎》成了引擎社的机关报，“壁报除发表小说、诗歌外，杂文和评论大都是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进行尖锐的抨击。壁报还出版过纪念‘五四’和纪念鲁迅的专刊……”^①“皖南事变”后，在共产党的指示下，引擎社停止了活动。

在此期间，几个群社的下属团体也相继单独开展活动，成为独立的社团，如冬青文艺社、热风壁报社、腊月壁报社，还出现了几个与群社关系密切的社团，如俄文学习班、木刻研究会等。同时，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也公开活动，在学生中组织了几个社团，出版《微言》、《明报》、《青年》、《指南针》、《照妖镜》、《大学论坛》、《熔炉》等壁报。以上壁报均有文学、艺术作品发表。

二、戏剧社团

中国现代文学史讲社团一般是从 1906 年诞生的戏剧社团春柳社开始的，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的出现则晚于春柳社 15 年。这说明戏剧

^① 许京骐、刘楷：《联大工学院的引擎社》，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笛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团体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开路先锋。西南联大文学史的情形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样：戏剧演出在前，文学社团成立在后。

长沙临大已活跃着一支文艺队伍。临大学生组织了宣传队，走出校门向当地民众宣传抗日，还组织了演剧队排练节目，到部队慰问演出。岳麓山下文学院的学生则组织了“临大话剧团”，参加当地戏剧团体举办的劳军汇演，演出剧目是阳翰笙创作的《前夜》。由于演出水平较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8年暑期，临大话剧团的一些成员在昆明排演了《前夜》、《汉奸的子孙》等戏剧，宣传抗日。有的学生参加了昆明金马剧社《黑地狱》的演出。开学后，一些爱好戏剧的同学准备更好地宣传抗日，便分头联络戏剧人才，酝酿演出。这一举动得到闻一多、孙毓棠、陈铨等老师的支持，演出剧本选定《祖国》。《祖国》是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陈铨根据法国剧本《古城的怒吼》改编成的四幕剧，写一位教授不计个人恩怨和安危，与群众一起向日寇和汉奸进行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故事。陈铨教授任导演，闻一多教授为舞台设计，孙毓棠老师做舞台监督，并请凤子参与主演。在排练《祖国》的过程中，大家觉得成立一个团体能更有效地工作，于是在12月底，组成了西南联大话剧团（简称“联大剧团”），有成员60多名，主要成员有男同学张道骧、汤一雄、徐贤议、李善甫、汪雨、刘雷、高小文、劳元干等，女同学有“三萱”、“三华”，即黄萱、徐萱、肖庆萱、侯肃华、孙观华、张定华等，请闻一多、陈铨和孙毓棠为导师。成立会上，闻一多、陈铨、孙毓棠、凤子等老师讲了话，同学们发言踊跃，热情很高，会上选出了团长和干事会。在联大剧团成立的鼓舞和推动下，《祖国》排练质量很高。1939年2月18日，在新滇大戏院举行了首演。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昆明、重庆、上海的报刊迅速作了报道。《祖国》连演8场，至25日结束。《祖国》演出成功后，大家的热情更高了，剧团接着又排练了“好一记（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等独幕剧和云南方言剧到昆明郊区演出。1939年暑期，曹禺应邀来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其中，《原野》由联大剧团主演，《黑字二十八》由联大剧团、

金马剧团、云南艺术师范学校等联合演出。演出从8月16日开始,直到9月17日才结束。全部演出场场爆满,昆明为之轰动,其盛况,在“云南话剧运动史上可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①。1940年夏,剧团又公演了《雷雨》。在昆明当时的几家戏剧团体中,联大剧团是实力较强,影响较大的一个。

在《原野》和《黑字二十八》演出之后,联大剧团的领导权被三青团篡夺,于是群社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决定另组一个剧团。经张贴启事征求社员后,1940年暑假,成立了戏剧研究社,社员很多,主要有黄辉实、潘申庆、施载宣、林元、李典、金连庆、冯家楷、李芳、孙观华等。戏剧研究社首先排演田汉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阿Q正传》,请郑婴老师任导演。此剧演员甚多,出场40多人,加上后台工作等,总共有200多同学参加了演出工作。9月25日,在云南省党部礼堂首演。演出一举成功。之后再连演14场,场场满座。收入除去开支,结余3000多元,全部捐给了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戏剧研究社还参加过群社组织的下乡演出活动。“皖南事变”后,戏剧研究社被迫停止了活动。

此期出现的文艺团体还有青年剧社和联大歌咏团等。青年剧社演出过《前夜》,联大歌咏团曾在“五四”21周年纪念会、昆明广播电台成立广播音乐会和南屏电影院开业演唱会等集会上演唱歌曲。

总的来说,此期西南联大戏剧社团的活动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剧团不多,主要有联大剧团、联大戏剧研究社和青年剧社三家;第二,独创的剧本几乎没有(只有联大剧团演出过陈铨改编的剧本《祖国》),剧团主要演出他人的剧本,但演出成绩较为可喜,《祖国》、《原野》、《阿Q正传》的演出都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原野》的演出,在云南戏剧演出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被史家称为云南戏剧舞台上的四次重大演出之一^②;第三,从内容上看,演出的剧目都是宣传抗日、鼓舞抗战情绪的。此期戏剧社团的意义除宣传抗日的良

① 李济五语,转引自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58页。

② 见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和吴戈《云南现代话剧运动史论稿》二书。前者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后者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好社会效果外,还在于继承了长沙临大话剧团的精神并开创了西南联大戏剧的良好传统,为西南联大的戏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文学社团

长沙临大时,还没有组成文学社团(当时称“文艺社团”),但组织过文学活动。据赵瑞蕙回忆,“在南岳时已有多次诗歌活动,如朗诵会,谈诗会和诗歌墙报等。其中有两期墙报是王般学长主编的。《穆旦诗选》中最早的一首诗《野兽》,正是在南岳读书时写的,刊登在一期墙报上”^①。西南联大在长沙的时间不长,已有这些文学活动,有这样的成绩,相当可观。同学的才能在活动中展现出来,也就被有心人发现了,所以,“到了蒙自后组织南湖诗社时,向、刘两人便邀请在南岳时已知道的喜欢诗的二十几位同学一起参加了”^②。

南湖诗社是西南联大的第一个文学社团,因诗社社址在秀丽的蒙自南湖畔而得名。1938年5月20日成立,发起人是向长清和刘兆吉,成员都是中文系、外文系和教育系的学生,主要有穆旦、赵瑞蕙、刘绶松、陈士林、周定一、刘重德、李敬亭、林蒲、陈三苏等20多人,闻一多和朱自清是诗社聘请的导师。诗社没有明确的宗旨,从今天所见的材料看,研究新诗、创作新诗是诗社坚持的方向,同时也是社员们的共同追求。诗社也没有选举组织领导,社务由向长清总理。有导师参加的社员大会开过两次,中心议题是关于新诗的现状与前途问题,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导师作了指导性的讲话,大家也踊跃发言,讨论使大家更明确了新诗的前途和方向。诗社创办壁报《南湖诗刊》,共出了四期,刊登诗作数十首。其中不乏好诗,如刘重德的讽刺诗《太平在咖啡馆里》,周一格律优美的《南湖短歌》,赵瑞蕙被朱自清称为“力作”的《永嘉籓园之梦》,穆旦的《园》等都是可以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上留有战争阴影,艺术上则显示出学院派的精致与完美,

^① 赵瑞蕙:《南岳山中,蒙自湖畔》(上),《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期。

^② 赵瑞蕙:《南岳山中,蒙自湖畔》(上),《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期。

既有现实特点,又有浪漫特色,代表了西南联大早期的诗歌风格。此外,诗社还对民间文学给予了关注,刘兆吉采集了当地歌谣 17 首,刊登在《南湖诗刊》上,这亦开启了西南联大重视民间文艺的传统。如果说刘兆吉在湘黔滇旅行途中搜集民歌是“个人”行为,那么诗刊掲載民歌表现出的已是“组织”或“群体”态度了,因此值得注意。

1938 年 8 月,西南联大蒙自分校迁回昆明,诗社离开南湖,也就停止了活动。到昆明后,南湖诗社更名为高原文艺社。高原文艺社每两周进行一次活动,吸引了更多同学入社,不久即扩大到四五十人。活动内容多种多样,如“七七”抗战纪念会、“五四”运动纪念会、文艺报告会、诗歌朗诵会等。高原文艺社出过几期壁报,吸引了老师、学生观看,其中一些作品在壁报上刊登后又投到报刊上发表,于是保存了下来,如赵瑞蕪和穆旦的一些诗。1939 年 5 月,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负责人萧乾从滇缅公路采访回到昆明,高原文艺社请他作过一次报告。

也是在萧乾的倡导下,高原文艺社再次更名为南荒文艺社,并且把社员扩大到校外,参加者中有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和同济附中的学生,西南联大新加入的学生有辛代、祖文、龚书帙、何燕晖等。社员把文章写好后,交给萧乾,由他编辑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同时,南荒文艺社还给风子在昆明编的《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撰稿,成为该副刊的主要支持者。南荒文艺社的主要活动是每周在翠湖海心亭茶室聚会一次,交流情况,畅谈创作心得等。社团没有选出社长和组织领导,由几个热心的同学共同操持社务,主要负责人仍是向长清。每个社员交出一篇作品作为“会费”,即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后,稿费归社里。仅凭作品供两份大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一端,就可以看出南荒文艺社的创作质量了。大约在 1940 年暑期,因社员陆续离校,南荒文艺社无形中逐渐解体了。南荒文艺社对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历史的创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吸收校外社员;第二,与报纸联合。这两个特点均为后来的文学社团继承和发扬。

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发展的